故宫走出宫门去考古

通过“走出去”,放眼世界,体察理解不同的文明,以“他者”的视角,也更有助于反观我们自身的文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提到“故宫考古”,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那就是在紫禁城里的考古吧。但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告诉你,故宫考古不止于这72万平方米,甚至也不是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而是更广阔的世界。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以世界视野,不断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关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研究动态,走出国门、跨越国界,来审视自身并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走出去”考古开启了中国考古国际化的征程。

徐海峰说:“故宫考古的基本宗旨是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发展与特点的宏观课题下,致力于与宫廷相关遗存的考古学研究,利用故宫自身优势,开展古陶瓷、玉器、铜器、建筑、美术、宗教等方面的考古研究。”

印度考古是故宫“走出去”考古的先导,开创了中国人参与印度考古的先河。

2014年,故宫博物院与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开展帕特南和奎隆港口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等工作;并根据对中国宋明时期文献的梳理,以寻找较为明确的海上丝绸之路遗迹为目标,对喀拉拉邦沿海主要城市的考古遗存进行全面调查。

故宫博物院在2020年举办“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展示中乌考古成果。 视觉中国供图

徐海峰介绍,帕特南遗址位于喀拉拉邦柯钦市帕拉沃尔镇西北,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时代集中于16至20世纪,即明万历时期至清朝末期。出土物以青花、白瓷及釉上彩瓷品种为主,产地为江西、福建、广东三地,以福建德化窑、漳州窑产品为最多,“反映出这一时期是以中国瓷器商品为主的一个贸易高峰期”。该遗址的发现,为深入认识柯钦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奎隆港口遗址则发现了大批来自中国9世纪以后的瓷器及铜钱,证实了中印间商贸路线经由西南印度的史实,为研究宋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环印度洋贸易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遗址出土的地中海及伊斯兰等地区的文物,证明其可能是中国与西亚、欧洲、东非等地区间海上交通线的重要节点。

徐海峰说:“(此次考古)一方面有助于了解西南印度的文化遗存和中国文物分布状况,结合中国丰富的文献资源优势,进一步明确了学术方向与目标,同时发挥中国科技考古的优势,有效推进了当地田野考古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深度的参与和广泛交流,切实增进互信和理解,达成诸多共识,为今后的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走出去考古可贵的收获之一。”

印度之行后,2017年,经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介绍,故宫博物院与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古物与博物馆部建立联系;2019年正式签署“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与拉斯海马酋长国古物与博物馆部三方协议”;同年,联合考古队对祖尔法遗址区内的阿尔努杜德和阿尔马塔夫遗址,进行两次考古发掘。

考古学者在阿尔马塔夫遗址采集到大量中国陶瓷标本,经科技检测和数据分析,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中国陶瓷器输入该地区的时间为元代至明早期、明中晚期至清早期两个大的阶段;二是采集到了明早期龙泉官样青瓷和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青花瓷,这是明朝官方与该地区交往的珍贵实物证据。

徐海峰说,在拉斯海马祖尔法遗址区开展的考古工作,运用中国田野考古理念、方法及先进的科技考古手段,以中国外销瓷的类型学分析建立较为可靠的遗址年代序列,为后续较大面积的发掘提供参照,揭示我国古代陶瓷贸易对波斯湾地区的影响。

2019年4月至5月,故宫博物院应肯尼亚基西大学的邀请,对肯尼亚东部沿海17处斯瓦希里文化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并对拉穆博物馆收藏的陶瓷器标本进行了初步整理。斯瓦希里文化是东非沿海地带以海外贸易为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是融合非洲本土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多元文化集合体。

2019年,应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邀请,故宫博物院及多家国内考古文博单位,对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费尔干纳盆地奥什地区的遗产地点进行实地踏查。不同时期城市与人口迁移的迹象,反映了交通线路的变迁,为我们探讨及研究丝路沿线城市分布规律提供了借鉴。

这些年来,故宫的考古学者还与德国考古研究院合作参与希腊古奥林匹亚遗址的考古测绘工作,深入了解了西方考古理念与测绘方法,加深对希腊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与西北大学合作参与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墓地的发掘,展现了中国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考古水平和研究实力。

徐海峰回顾了故宫博物院走出去考古的历程,从最初的建立联络和接洽关系,到不断增进互信,建立良好的、可持续的合作与沟通机制;从有限地开展考古调查,以西方考古方法主导的工作模式,直至近年来形成区域系统调查、运用中国田野考古的方法理念自主承担工作的局面,“来之不易,经验可鉴”。

徐海峰认为,考古成果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中国考古界新时期以来国际交流的空前活跃;另一方面得益于故宫博物院搭建的开放、交流、合作、共享的学术平台,使“走出去”考古成为故宫博物院学术拓新、对外交往、文化传播等的重要方式。

除了考古“走出去”,文物展览一直是故宫博物院“走出去”的传统项目,是境外观众了解中华民族灿烂悠久历史文化的最佳方式之一。近10年来,故宫博物院引进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地区的18个文物展览,先后组织赴外及港澳台地区文物展览46次,参与境外合作机构及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组织的文物展览15次。

“在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视野下,我们进一步阐释中华独特的文明成果对世界不同文明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更进一步增强‘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能力,从而不断加深不同文化人群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徐海峰说,“通过‘走出去’,放眼世界,体察理解不同的文明,以‘他者’的视角,也更有助于反观我们自身的文明,从而以更加平等、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理解与建构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

作为一本散文家之书,更多值得探寻的,是藏于幽微细节之处对普遍规律与人性禀赋的洞察,那是作者与读者建立联系的秘密通道。

《中国历史的体温》:用开阔之地承载历史的重量

□ 韩浩月

春天是读书天,风从阳台拐个弯吹进室内,与身体发肤接触的瞬间,凉中带暖,且携带了春草与春树的气味,令人心旷神怡,要不“春风拂面”这4个字,怎会常被用来形容愉悦与舒服?

读的是散文家穆涛先生所著《中国历史的体温》。内容风格明显是“大散文”,但字里行间时而蹦出一两句“俏皮话”,又在提示读者,这是拐过弯的表达方式,如春风过阳台,消弱了速度,增加了温度与气味,在保证文本的严肃与学术价值不受损的同时,可以提高阅读的趣味性。

这几年读历史书,对“历史的温度”这一说法颇有共鸣,历史如果是条长河的话,那么用温度作为度量衡,便会发现有的阶段沸若岩浆,有的阶段冷若冰霜,总之让人感觉到舒适温度的阶段,不多且不长。《中国历史的体温》找到了评价中国历史的关键词——“体温”,这是一个非常妥帖的角度,人类标准体温约为37℃,某一段历史如果能够保持这一触感温度,想必也是现代人最想穿越回去的时代了吧。

《中国历史的体温》主要篇章以《汉书》《史记》为参考对象,对汉代的人与事进行了一番打量。阅读这本书,对3个人有了更深的印象。其一是董仲舒,汉武帝刘彻与他,以通信的方式三问三答,“天人三策”的过程中,两人相互试探、彼此尊重,董仲舒深谙“直言有讳”的职场情商,与上司进行了一场高质量对话。作者穆涛在写作相关章节时,曾寻访位于西安城北策村的董仲舒墓,古今两位读书人在此有了一次无形的交集,穆涛用本书罕见的大段感性文字表达了对董仲舒的看法。

其二是刘濞,刘邦在册封他这位侄子时,忍不住说了一句“一看你就天生带着谋反的小样儿”(“若状有反相”——《史记·吴王濞列传》),穆涛也在书中写到“刘濞不太具备一个政治人物的基本素质,性格外露,脑子不够清醒,执拗任性,甚至还有点一根筋”,但傻人有蛮劲,刘濞在封地仗着铜矿与海盐资源,大肆偷铸铜钱、生产海盐,把自己和吴国老百姓的小日子搞得有声有色。刘濞的一生是被怀疑的一生,他后来发动“七国之乱”,更像是赌气行为,但确实这个人志大才疏,刘邦对他的怀疑与鄙视,是正确的。

其三是刘邦,刘邦的故事有许多,但他为老父亲刘煓所做的一件事,还是足见其性格特征。刘煓当了太上皇,还是闷闷不乐,刘邦问及原因,才知道父亲是想念老家了——按穆涛的说法是,对“农家乐”生活念念不忘。于是刘邦在今天西安临潼的东北方向,按照沛郡丰邑(今江苏徐州丰县)的样子,原样复制了一个,后来被称为“新丰”城邑,“家乡父老搬过来后,不仅人,连犬羊鸡鸭都走不错家门”。

读到穆涛对这些人与事的描写,总是会忍俊不禁。有一种幽默是深藏不露的,它不见于词句,也不显露于“脱口秀”式的表达,而在于选择的角度和叙述的方式。通过《中国历史的体温》中有关人物的描写,可以观察和感受到历史人物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董仲舒的“文化人范儿”,刘濞的“欢乐喜剧人形象”,刘邦“可以说他没文化,但他是个大孝子”……当历史人物散发出“人味儿”,他们不但自身具备了温度,也让承载着他们故事的书页有了温度,如此,当读者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触碰历史的时候,便不会产生被烫到或冰到的感觉了。

《中国历史的体温》中除了写到人,笔触挥洒令人印象同样深刻的,当属对节气与自然的描写。作者用着迷般的写法,去诠释端午节为何是古代的“国家防疫日”,此章节信息量之大,以及写作态度之端详,让这部分内容拥有一股摄人的仪式感,同样,董仲舒对于雨雹形成的讲解,融合了政治、文化、风水、地理等诸多要素,逻辑道理浑然天成,用网络上流行的说法是,充满了“科技与狠活”;对于“主气与客气”的解读,开门见山,条理分明,主气好理解——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便是主理一年四时的基本气象,客气便复杂了,方方面面,涉及到古代天文学范畴以及古代哲学的轴心地带,中国人对天地细致入微的观察,均可在主气与客气那里找到对应与落脚点……

《中国历史的体温》书名自带分量与重量,但散文家书写历史,通常会用一片开阔之地来承载历史的分量与重量,历史学家可以用散文家的笔调来写历史,散文家自然也可以用历史学家的口吻写历史,两种身份的交叉与跨界,均会带来阅读感受的化学反应。《中国历史的体温》作为一本散文家之书,在让人领略“大散文”之美的同时,更多值得探寻的,是藏于幽微细节之处对普遍规律与人性禀赋的洞察,那是作者与读者建立联系的秘密通道。

去仓库和市集淘书,你收获了怎样的消费体验

宽敞的库房空间,高高堆积的“书山”,对爱书人而言,不仅能感到身体的渺小,更有一种精神的震撼。

□ 城下秋

图书领域的热点,我们永远捉摸不透。即使新媒体已然成为人们购书买书的“强势”渠道,可图书领域依然持续涌现出线下体验的新花样。

比如,去仓库,去市集,淘一本书。

仓库、市集这类空间,以往在我们概念里是和日常生活用品绑定在一起的,是实打实的“消费行为”。如今,图书也被安放于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梭,在满满当当的书品里翻阅,这种选书经历是怎样一种感觉?

不管是在网络书店浏览式购书,还是在大型书店、特色书店“淘书”,读者面对的都是作为“商品”的图书。书店整整齐齐地把新书码放在书架上,分门别类,有侧重性地推荐。如果一本书是畅销书,或者店家预估值得推荐,就放在显眼位置,如果一本书是“长销书”,就放在属于其分类的货架上。

可是,很少有人触摸到作为“产品”的图书。一本书从造纸厂、印刷厂逐步生产出来,要在仓库里逗留很长时间,甚至很多书从诞生到作为废品再次被打成纸浆,都没有进入最终端的销售环节。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毫无价值,也有可能是因为销售渠道、周期等各种原因,没有机会进入最终的商品流通环节。

近几年,某家图书销售网站就开放了自己的仓库,报名顾客可以直接走进库房,随手从货架上抽出一本,放在购物车里。宽敞的库房空间,高高堆积的“书山”,对爱书人而言,不仅能感到身体的渺小,更有一种精神的震撼。

推着和超市推车一样大的选书车,一头扎进真正意义上的书海,你会感觉自己要被古往今来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成果淹没了,眼花缭乱,手足无措。

图书仓库有自身编码储存方式,并不遵循人们习惯的分类。一本儿童读物的隔壁,躺着的可能就是一本艰涩难懂的哲学著作;与一套历史文献为邻的,可能是一部“穿越”题材的小说。因此,第一次进入库房的读者,难免感到迷茫,发出读书的“哲学三问”:“我在哪里?我该读什么书?我怎么找到那本书?”

但是,在仓库里“淘书”,也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体验。你永远不知道货架最底层的隐秘处,会有怎样的“宝藏”。在足以容纳几百万本书的仓库里,有理由怀疑,有的书埋没许久,连仓库管理员也未必记得它的存在。有的书在仓库里是蒙灰的“滞销货”,在市场上却是爱书人趋之若鹜的“绝版”。

当然,仓库都在郊区,甚至远在需要乘坐高铁才能抵达的“卫星城”。尽管销售方给出了诱惑力极强的折扣,但算上往返路费,逗留期间的餐费,实际上并不能够“省钱”。

这笔账并不难算清,但几次活动下来,报名的人并没有减少,反响日趋热烈。有人“二刷”“三刷”,就为了在仓库里多待一会儿。还有一些颇有“生活家”气质的爱书人,以仓库淘书为中心,规划了行程饱满的一日游,顺带游览当地名胜古迹,一场淘书活动竟意外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

甚至有一些作家把签售会开到了仓库里。那样的画面和平时精致书店、咖啡馆的签售是截然不同的:午后阳光慵懒地打到一张旧书桌上,产生若有若无的丁达尔效应;作家也不像出席“高大上”的活动那样西装革履、正襟危坐,而是一身休闲打扮,与读者有一搭没一搭地交流着。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在仓库里,作家好像亲手把农作物浇灌出来的老农,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伪装,只有面对读者的真诚和大度。

面对网络售书和电子阅读的冲击,传统图书销售渠道如何突围?一些有创意的线下淘书活动给出了一种答案,那就是把购书做成不可取代的消费体验。消费者并不是冲着廉价、环境好前来,而是因为找书、选书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奇遇,就像在沙漠里“寻宝”一样创造意外的惊喜。

一家图书销售网站的仓储淘书会活动。 作者供图

近年来,图书出版机构、特色书店与阅读类媒体一起,共同发起图书市集活动,也打造了一种创新的阅读消费方式,给每座城市带来了一处周末值得“打卡”的乐游之处。

每年春光正好、人心愉悦的时节,作家、编辑纷纷来到城市公园、文创园里去“练摊儿”,不一定能多卖几本书,而是为了让阅读换个方式走进人心。各类讲座、沙龙穿插在图书市集期间,图书销售与文创经营实现同频共振,迸发出独特的魅力。

与此同时,色彩明艳、设计精巧的文创产品会和图书摆放在一起。它们的存在,也许只是书的装饰品,也许拥有自己独立的受众。在这样的市集里,毫无违和感,且越来越成了必不可少的“标配”。

在风景优美的露天场地里摆市集,“书-人-自然”三者结合,激发出别具韵味的购书氛围。选书买书这么私人的事情,在户外的鲜活空气里增添了“社交属性”,感官也因此打开。你和书摊老板的每一句交流,你和其他陌生选书者不经意看中同一套书的有趣默契,亦或是你凝神看书时身旁如BGM般响起的虫鸣鸟叫……这些都为单纯的“书味”增添了“人味”“自然味”。

无论你是为了散心而入市集,还是因为买书意外得到散心效果,图书市集这种形式可谓把买书和游玩两件事结合得相当出色,能满足大众的多元需求。

对了,不管是仓库“淘书会”,还是图书市集,很多都是要收“门票”的。一本书都还没买,你就要先付一笔门票钱,有的收费沙龙活动还不便宜,堪比到影院看一场IMAX电影了。

不过,现场人头攒动的场面充分说明,总有人甘之如饴,愿意为特殊的消费体验埋单。究竟是去书店、去仓库还是去市集?请走出家门吧,那本“命定”的好书冥冥中在指引你去寻找它。

说到读书,我真有“金句密集恐惧症”

视觉中国供图

“金句”不是作者喂养的产物,而有读者的参与。

□ 曹 林

常有一些小朋友跟我说,说什么书什么书是经典,可读后往往大失所望,读了大半天都读不到值得划线和摘抄的“金句”。或者看了某段“金句”被一本书吸引,可买来读后发现,书中像这样的金句太少,感觉被忽悠了。我知道,不少人都热爱这种“金句驱动式”阅读,我想说的是,这种功利式阅读,不是汲取知识营养的好方法。寻章摘句生吞活剥碎片化的金句,不沉浸到整体内容,效率其实非常低,糟蹋了时间,也糟蹋了好书和阅读。

“金句”往往是一长段材料铺垫和扎实论证后的“飞跃性概括”。比如阿多诺说:在一个从众的大众社会中,偶像崇拜往往通过某种“伪个性化”的方式来操纵,并以此掩盖了文化工业本身的标准化和同一性。这句话够“金句”吧?但它不是孤立的,认真读了前面的铺垫与论证,这个结论才是顺理成章的、有理论活性的。经历了这个过程,“金句”才能进入你的知识体系,成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有活性的思想,让你在写作时自由调用,支撑你的输出。否则,割裂了来源,只把这一句当金句摘抄下来,在笔记本上形成记忆假象,很快便会成为被遗忘的“死教条”。

刘擎教授也说过:我们传统的学院派教育强调知识要有系统,要有完整的结构和逻辑关联等等,而年轻人比较喜欢丰富而碎片化的知识和感受,所以他们喜欢“金句”。我觉得,一个比较闪光的句子,那都是在整体论述之后出现的,它是有上下文的。

不在知识的系统和整体面貌中去理解一句话,那种“金句”是无法“致知”的。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区别了“知识”(knowledge)与“致知”(knowing),“知识”是“致知”的一个结果,重要的是“致知”过程。阿伯特批评说:大部分我教的学生认为,知道一些东西就是知道一个网址。他们致知的主要模式是去“寻找”(finding)。对他们来说,“阅读亚当·斯密”意味着寻找每一章中真正重要的五六个句子。他们不明白,亚当·斯密其余的句子都包含着论点和论据,他用这些论点和论据来产生并捍卫这些学生划重点的部分。对学生们来说,阅读只不过是在网络以外的地方浏览。它是一种过滤掉无关紧要的闲散部分,并找出真正重要事情的练习。他们实际上不相信思想,他们相信碎片化的内容。对他们而言,斯密的理论不是一个论证,而是固定的内容。

阿伯特实际上批评的也是这种“金句驱动式”阅读,一本书,只想要给总结出几个“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关键结论”就行了,能让我免除“阅读那些闲散内容”之苦,多好啊。这种过滤和筛选,只要那些“碎片金句”,实际上根本没有读进、读懂一本书,金句自然也没有进入一个人可以自由调用的知识储存。表面上读了很多书,却又大脑空空如也!

我一直觉得,“金句”不仅是作者辛苦论证的结果,不是某种灵光一闪,也是读者沉浸到一本书中,辗转反侧辛苦跋涉后豁然开朗的一种阅读报偿。也就是说,“金句”不是作者喂养的产物,而有读者的参与。进入作者的理论构境,沉浸于其逻辑中,读通了,读透了,读到了作者的深层意涵,读懂了逻辑关联,读到了与现实对应的思想,理解了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困惑,“金句”就出来了。一个真正沉淀到自己知识体系中的“金句”,必然在对话中包含自己的某种思考。我读韦伯关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论述,之前一直没读出味道,但那段时间新闻中有很多“把人当成工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只看程序不顾人命”的事件,就悟到了工具对价值的碾压,悟到了“由于他们的行动与结果之间有着很长的链条,他们的道德意识就会模糊从而导致道德盲视”的金句内涵。

阅读是一种对话和生成,需要沉浸其中,“金句”是对沉浸阅读的一种思想犒赏,而不是可以单独抽出来的“精华”。那种抽出来的精华,没头没脑地“上价值”,往往只是一种营销策略。一位著名读书人谈到过“畅销书三规律”:第一个,把你已经知道的事情用你不知道的说法说一遍;第二,把刚刚的说法重复一遍,再举一些例子;第三,再重复一遍进行总结,就成功了。那些关于某本书鸡汤式、促销式金句,多是为不读书的人量身定做的,只不过是“把你已经知道的事情用你不知道的说法说一遍”,只是你认同的、你熟悉并了解的道理,换了种说法,而已。

我读书,是有“金句密集恐惧症”的,全是金句,哪受得了啊?金句是一大段论证后的“飞跃性概括”,是画龙点睛的妙笔。全是金句,说明根本没有论证和讲道理,全是鸡汤般的、迎合你的、巧言令色的结论。就像华而不实的PPT,充斥着“好听却空泛的漂亮词”。更像某些假大空的评论,听起来头头是道声声入耳,似乎金句连连,仔细琢磨,什么内容都没有,只有空洞的排比和肤浅的押韵。舆论场上充斥着这样的骗子,遇到不懂的事,说一堆“漂亮话”就能糊弄过去,故弄玄虚,美其名曰妙语金句。

我也不喜欢那种“寻找标准答案”式读书,如果把书的内容当成“可以抄的答案”,那还是应试思维,没有什么营养。好书在于能引发思考,在于那个论证过程带来的思想激荡,挑战了某种常识,启发了某种新思,带来了某种智识。智识是什么?如果说智力指向一种标准答案,智识则是一种“把答案变成问题”的能力,这是一种高级素养,能在新问题中把思考推向更高的观念水位,迈向通透的智慧。

是的,越是好书,你越是无法从中得到“标准答案”,却能产生很多问题,这些问题能帮你摆脱“无知的确定性”,挑战大部分应试教育潜藏于你思维中的“天经地义”和“不证自明”,在经历“多元的混乱性”之后,走向批判性思维之境界。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说:“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嗯,读书绝不是功利的、速成的、热闹的、立竿见影的,但我也觉得,读书又绝不会辜负你,享受了过程,沉淀了思考,总会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滋养你。